

村上衛著，王詩倫譯，《海洋史上的近代中國：福建人的活動與英國、清朝的因應》，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6年，688頁。

改革開放以來，海洋史研究在中國大陸史學界受到越來越多的關注。近年隨着「一帶一路」國家級戰略的出臺，海洋史研究更是熱鬧。不過，在海洋史研究的熱潮中，日本學者村上衛的新著《海洋史上的近代中國：福建人的活動與英國、清朝的因應》（譯自村上衛，《海の近代中國福建人の活動とイギリス・清朝》，名古屋：名古屋大學出版會，2013，以下簡稱《海洋史上的近代中國》）令人耳目一新。該書選題至少具有兩點新意：一是研究區域的選取。以往的近代海洋史研究聚焦於鴉片戰爭前後的廣東以及鴉片戰爭後的上海和天津等通商口岸，19世紀以廈門為中心的閩南社會在近代史研究中幾乎不被提及。村上衛選取了前人關注不多的閩南社會展開研究，可謂獨闢蹊徑。二是整體的海洋史研究視角。以筆者的理解，該書的整體海洋史研究有兩方面的表現：一方面如作者所言，「除漢文史料外，還將充份利用在『海洋史』方面資料具有壓倒性豐富程度的英文一手史料，針對貿易、海盜、船難、移民等『海洋史』的主題，加以多方面的探討。因此，本書可能會是最先描述晚清中國『海洋史』整體的圖書」。（頁9）另一方面，是對東南海上社會「民眾」的重視。該書對19世紀東南海洋史的研究表明，正是無數民眾自行採取的零散行動推動近代中國的走向，他們不僅將列強的影響降至最低，甚至擺弄、牽制了列強。可以說，村上衛認同的海洋史，是眼光向下的整體海洋史。

日本中國史學者重視中國海洋史研究，有着脈絡清晰的學術史。村上衛遵循日本對中國史研究的學術理路，同時注意到不足：前近代海洋史研究的活躍與近代海洋史研究之間無法交集，二者之間存在斷層。雖然鴉片戰爭已不再被視為中國近代的嚆矢，但是日本史學界仍然缺乏19世紀前期的歷史研究，新史料發掘也沒有進展。村上衛試圖在前近代史與近代史之間找到某種連續性，在他看來，這一連續性應當在中國東南沿海民眾數不勝數的卻又零散的行動中把握。

村上衛借由以下九個子題對19世紀的福建人展開討論：零散鴉片貿易、漢奸、海盜、船難、秘密結社、苦力貿易、廈門貿易、廈門善堂與鴉片捐、英籍華人等。九個子題貫穿19世紀東南海洋社會，既有時間上的連續性又相互獨立。因此，本書由三部共九章構成。福建人的零散鴉片貿易與漢奸問題

發生在鴉片戰爭前和鴉片戰爭時期，為第一部兩章主題。而海盜、船難、秘密結社、苦力貿易等四個論題直指19世紀中葉沿海秩序重建中的福建人，為第二部四章主題。第三部以19世紀後期廈門為中心，包括廈門貿易、廈門善堂與鴉片捐、廈門的英籍華人等三章主題。作者希望九個子題能回應日本中國史界三個課題的爭論：交易的特點與仲介的機能、沿海社會的管理、對英國在中國近代扮演角色之再檢討。（頁9）

村上衛的意見簡述如下：福建人早在清朝海關通過牙行、會館進行管理的海外貿易制度中就與廣東人共同發揮作用。不過，鴉片貿易開始以後，廣州附近海面上的鴉片貿易形成巨大的利權結構，甚至凌駕於海關管理的一般海外貿易之上。在新的利權結構中無法佔有一席之地的福建和廣東沿海民眾，避開廣州，聯結港腳商人進行零散的鴉片貿易，將之擴大到天津、上海等地。對清政府而言，管控這類規模很小但數量眾多的海上貿易變得非常困難。鴉片戰爭時期，正是這群參與鴉片貿易的福建、廣東沿海民眾，因為直接面對列強及其商人，在清朝官方文件中被冠以「漢奸」罪名而遭到殺害或俘虜。沿海各地則紛紛組成團練、鄉勇，採取船舶管制、封港等行動堵截、分化漢奸。難以被管控的東南沿海民眾，成為鴉片戰爭後海盜問題和各種叛亂發生的根源。

清廷借助英國海軍的力量，先掃蕩福建海盜，後扼制廣東海盜，將貿易集結在通商口岸，恢復了鴉片戰爭後的沿海秩序。中國沿海地區進入了以通商口岸為中心的新時代。但是，當英國等外國船隻越來越多進入中國海，遭風遇險的船隻也越來越多。如何應對船難？清朝的對策集中在遣返外國船難的生還者。鴉片戰爭以後，英國利用通商口岸和領事館系統派遣英國軍艦，以保護英國人的生命財產。清朝通過遣返制度，同時借助英國軍艦鎮壓地方反叛，使地方秩序得以恢復。令人感興趣的是，清朝中期制定的漂流民遣返制度為何在近代沒有被動搖？近年來相關研究表明，清朝隔離夷狄的外交政策繼續在近代被推行，包括禁止中國人與外國人接觸，外國人越來越被限制在通商口岸等等，這解釋了船難生還者遣返制度為何能夠繼續發揮作用。

隔離夷狄的政策繼續實行，清廷卻在通商口岸遭遇了新的夷狄——華僑。開埠後廈門華僑利用外國籍特權謀取利益，當然也包括各種違法行為，這使得他們與地方官員和民眾關係惡化。為了自保，廈門華僑組成小刀會，勢力迅速擴大，此舉遭到地方政府的徹底鎮壓，英國領事卻無法提供有效保護，廈門華僑被迫返回東南亞。顯然，開埠後福建華僑移居東南亞，不僅有謀生和貿易的需求，他們在通商口岸廈門的尷尬境遇，也是移居的重要原

因。福建人向海外的移民，苦力貿易是一種重要的形式。在傳統移民基礎上，19世紀中葉以後外國人與中國人建立起勞動力供需合作，在沿海秩序混亂狀態中尋找出洋的勞動力。從事這一行業的人被稱為客頭，海外華人勞動力需求的擴大使客頭為了尋找優質勞動力而採取拐騙、綁架的不法行為，但往往招致地方社會強烈的反對。廈門暴動成為解決苦力貿易問題的契機。清廷得用英國領事向外國商人施加壓力，苦力貿易的管理實際轉移到英國等外國人手中。像這樣利用歐美外國制度打擊走私、鎮壓叛亂和海盜，管理沿海社會，是清廷在近代的慣常做法，它使清朝的沿海統治秩序得以逐漸恢復。

隨着沿海社會秩序的恢復，向東南亞移民為福建人提供了新的機會，廈門成為19世紀後期閩南腹地和臺灣組成的經濟圈中心。經濟圈的砂糖、大豆貿易連接了華北、東北沿海地區，砂糖、棉布則與華中沿海地區、東南亞地區連接起來。19世紀末全球性的貿易擴大以及產地的激烈競爭，臺灣從經濟圈脫離出去，廈門的商品輸出逐漸衰退，經濟圈逐漸崩潰，代之以泉州府為中心的閩南新腹地。然而廈門憑藉強勁的華僑匯款保持了閩南地區經濟中心的地位。不過，對廈門經濟中心地位有所貢獻的還有一種特殊商品——鴉片，它不僅是廈門開埠前的主要輸入商品，開埠後仍然佔有重要地位。針對鴉片貿易的《煙臺條約續增專條》出臺前，鴉片釐金等稅是地方重要財源。條約實施後，失去外國鴉片徵稅權的福建地方政府試圖通過善堂捐恢復稅收以及對中國鴉片商人的掌控，卻導致外國鴉片貿易衰退。掌控閩南外國鴉片貿易的廣東買辦無法深入閩南腹地，隨着外國鴉片貿易衰落相繼退出廈門，以零散鴉片貿易為主的福建人借此確保了自己的網絡。但是，福建人並沒有繼廣東人之後成為外國商人的買辦，原因之一是這一時期徵稅不再是利權而是負擔，同時英國領事對英籍華人的保護也頗為有限。

19世紀後期，廈門的英籍華人實際處於清朝和英國都對其懷有戒心的境地。隨着英籍華人與當地中國人的債務糾紛增多，他們憑藉自己的國籍身份尋找英國殖民地制度的漏洞，從而確保自己的利益不受損失，英國領事則忙於解決糾紛而無暇他顧。19世紀末至20世紀初，針對英籍華人問題，英國重新調整殖民地制度，但廈門領事館的功能無法應對這種改變，領事只能限制英籍華人的活動，卻給臺灣籍（日本）華人提供了擴張的契機。由此看來，外籍華人的國籍選擇，不過是方便其活動的一種策略，與近代制度的先進性無關。清朝地方官員和英國領事當然清楚這種情況，因此他們不但沒有力保護華人，也無意保護。廈門的英籍華人游離於各處通商口岸，甚至頻繁往返於中國與東南亞，就是在不同制度中尋找更有利的發展空間，確保經濟活

動的順利進行。

村上衛注意到英國等國家以通商口岸為核心建立的近代制度，在推行過程中遭到了既有社會經濟制度的阻攔，或者說遭到分散的民眾行動的阻攔。相似性擴大的通商口岸制度與既有社會經濟制度並行不悖，使近代中國呈現多樣化發展的趨勢，這與以往的時代並無不同。但是，以英國為代表的西方「近代」制度在中國的推行短期內非常強勁，且發生作用的範圍廣泛，這又與以往的時代相異。

《海洋史上的近代中國》對19世紀福建人的討論，建立在兩類史料基礎之上。一是英國國家檔案館藏中國檔案，尤其是英國領事檔案，村上衛在後記中憶述這部份檔案對其研究的意義。通讀全書，每章都大量引用英國國家檔案館藏中國檔案，可以說本書是對英國所藏中國檔案利用豐富、全面的學術專著。二是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檔案，特別是已整理出版的《鴉片戰爭檔案史料》，該書引用率非常高。上述兩類史料構成本書基本史料，其中英國藏中國檔案絕大多數屬於未刊史料，也少有其他學者系統地整理和引用，在近代史新史料發掘整理方面，本書貢獻良多。

可是，基於中國和英國國家檔案館藏檔案的研究，雖然有着迥異前人的視角和觀點，但兩類史料有一個共同的特點，即都屬於官史文獻。史料的官方立場使筆者對本書的研究對象「福建人」抱有一絲懷疑，這些史料中的福建人是否能夠代表19世紀東南沿海社會的民眾？眼光向下，既要關注官史文獻中的民眾，也要關注民間文獻中的民眾。記載19世紀福建人活動的民間文獻，是否有異於官史文獻？民間文獻中的福建人，與官史文獻中的福建人是一回事嗎？筆者以為，走進沿海民眾的社區開展田野工作，記錄、搜集民間文獻，理解民眾從自身出發表達的海洋歷史，才是更為全面的整體海洋史。

段雪玉
華南師範大學歷史文化學院

吳滔、于薇、謝湜主編，《南嶺歷史地理研究·第一輯》，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16年，288頁。

吳滔、于薇、謝湜主編的《南嶺歷史地理研究·第一輯》，是中山大學歷史地理研究中心規劃的《南嶺歷史地理叢書》的首批成果之一。中國的歷